

看清这个主张远非“水土不服”那么简单——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之所以通过相关决议，显然另有所图。

## 【论 文】

# 共产国际代表的是国际主义还是国家利益<sup>1</sup>

## ——国民党一大宣言及其对民国民族政治的影响（二）

熊芳亮

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是因为在苏联国家利益上包藏私心，共产国际通过的相关决议在民族主义的表述上就会更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就会更加符合中国革命形势与任务的实际需要。

——题记

历史证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的决议，既是共产国际开辟世界革命的“东方战线”、实现与孙中山合作构想的一部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维护和实现苏俄国家利益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干扰和影响。

问题的核心，就是外蒙古问题<sup>2</sup>。自1911年外蒙古政教首领八世哲布尊丹巴在沙皇俄国的掇掇、怂恿之下宣告“独立”以来，外蒙古问题就成为中俄之间的外交旧案。自1912年起，中俄进行了多次谈判，袁世凯和北洋政府一直坚持中国政府对外蒙地区的国家主权，沙皇俄国也承认中国对与外蒙的“宗主权”。沙皇俄国倒台之后，外蒙古失去外援曾于1919年11月17日宣布放弃“自治”，“恢复旧制”。但由于北洋军阀内部的派系斗争和割据混战，先是在外蒙古本有自愿回归之意的大好时机之下放弃协商努力，反而炫耀武力以军事手段乘机扩张地盘，尽失外蒙人心；后又因军阀混战不惜从外蒙古撤军回援，在沙俄残匪1921年2月攻入外蒙之际直奉各派又是彼此掣肘畏敌不前，将外蒙古控制权拱手让人，直到苏联红军攻入并事实上占领外蒙古。1921年7月，苏俄即在外蒙古成立亲苏政府，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并与外蒙古订立了《苏蒙修好条约》，双方相互承认为合法政府。为维护外蒙古主权，北洋政府自1922年起即与苏俄政府进行外交谈判，谈判的焦点，就是外蒙古的主权问题和苏俄军队的撤军问题。

1919年，苏俄联合世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组织成立了共产国际。1920年，共产国际通过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确立了开辟世界革命“东方战线”的战略构想。自此之后，苏俄方面即在与北洋军阀开展外交谈判的同时，积极在中国寻找政治盟友和伙伴。1922年底，经过长期的相互试探和左右权衡之后，苏俄代表越飞与孙中山达成了政治合作的框架协议<sup>3</sup>。1923年1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全面支持国民党”的决议，并要求外交人民委员会部和共产国际的代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sup>4</sup>。1月26日，孙中山与越飞发表联合宣言，越飞承诺苏

<sup>1</sup> 本文刊载于《中国民族报》2012年7月20日，第7版，发表时有删节。

<sup>2</sup> 俄共（布）之所以对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抱有戒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心孙中山成为“凯末尔”第二。凯末尔曾经得到苏联的大力援助，但是随后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与苏联反目成仇，令苏联对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的援助有点杯弓蛇影。用鲍罗廷的话说，在被土耳其的热咖啡烫过一次之后，俄共（布）在国际援助方面连一杯凉水都要用嘴吹一吹。也正因为此，俄共（布）才会对孙中山在外蒙古问题上的立场更加敏感。所以归根结底，问题的核心其实还是外蒙古、中东路等问题。

<sup>3</sup> 关于双方合作的形成背景和政治原因，学界已有相应的研究论述和学术成果，笔者不在此展开论述。

<sup>4</sup>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42号记录（1923年1月4日于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6—187页。



俄不向中国输出共产组织和苏维埃制度，亦承诺“决无亦从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而孙中山则原则同意苏俄“不必立时从外蒙撤退”<sup>1</sup>。

史学界对孙中山允许苏联在外蒙古驻军的举动颇多非议之处，却对其中内情讳莫如深。实际上孙中山在与越飞达成的政治框架协议中另有所图：那就是在新疆和蒙古地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从北方实施“北伐”，攻取北京，进而夺取全国政权<sup>2</sup>。无疑，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冒险计划。在1923年1月26日越飞写给俄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中，我们可以知晓孙中山军事计划的大概内容，但是我们还无法知晓越飞是否对孙中山作出某种政治承诺，至少越飞在信中强调自己并没有当面否定孙中山的计划。越飞同时指出，孙中山这套“从头到脚完整彻底的计划完全指望于我们的帮助和支持”<sup>3</sup>。1923年3月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以可能引起日本干涉为由，否定了孙中山的军事计划（“否决计划中一切可能引起日本干涉威胁的部分”），并向越飞强调孙中山应更加注重组织准备工作<sup>4</sup>。

诡异的是，孙中山似乎并没有得到其军事计划被俄共（布）中央否决的讯息，并继续安排派遣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代表团访问苏俄，且其首要任务就是与苏联方面沟通、磋商实施北方军事计划的细节。而与此同时，苏俄亦决定派遣鲍罗廷作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sup>5</sup>来到中国。就目前所知的材料而言，我们还无法确知苏俄方面是否在军事计划方面对孙中山进行了政治讹诈，即以支持军事计划为条件引诱孙中山同意苏联在外蒙古暂缓撤军——因为苏联方面确实曾就在支持外蒙古和支持中国之间做过政治选择，马林和越飞都曾建议不要因为蒙古问题而损害同中国的关系<sup>6</sup>。但是很显然，孙中山的军事计划因为涉及外蒙古问题而令苏俄方面备感焦虑。11月27日，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与代表团进行会谈，明确表示“国民党准备好政治条件后可以在自己国内，而不是像计划中所说的那样从蒙古开始军事行动”；“在目前条件下，一个严肃的政治纲领要比一个不好的军团具有更大的意义”。托洛茨基在谈话中暗示蒙古独立的观点，引起了蒋介石的强烈不满<sup>7</sup>。

就在蒋介石为首的代表团访问苏联期间，共产国际决定起草一份“重新解释”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决议。现有的文献资料还无法确知决定起草决议草案的具体时间和确切事由，不过托洛茨基11月2日曾致信契切林和斯大林，提出要转移中国国内工作的注意力，“把99%的注意力从大的联合行动转移到现有军队中从政治上组织居民的工作上”。决议草案是由维经斯基（吴廷康）等人起草的，决议草案曾由季诺维也夫于1923年11月23日送交契切林和布哈林审阅，因此决定

<sup>1</sup> 孙中山在此前提下同意“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孙文越飞联合宣言》（1923年1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1—52页。

<sup>2</sup> 《孙逸仙给越飞的信》（1922年12月20日于上海）。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5—16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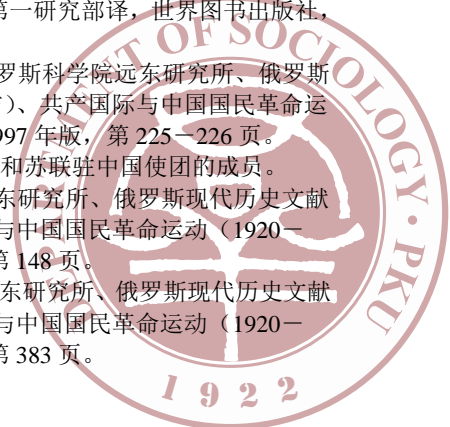
<sup>3</sup>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5页。

<sup>4</sup>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3号记录》（1923年3月8日于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5—226页。

<sup>5</sup> 鲍罗廷的任命经过俄共（布）政治局会议审议批准。鲍同时也是苏联政府代表和苏联驻中国使团的成员。

<sup>6</sup> 《越飞给契切林的电报》（1922年11月7日和8日于北京）。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8页。

<sup>7</sup> 《鲍罗廷同瞿秋白的谈话记录》（1923年12月16日于上海）。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3页。



起草该决议的动议显然应该更早。共产国际迟至 11 月 26 日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举行会议时，才正式提出“共同”起草“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决议。这个要求显然超越蒋介石和国民党代表团的权限和访问目的，遭到蒋介石的拒绝<sup>1</sup>。但是，共同起草决议的决定，还是出现在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之中。1923 年 11 月 28 日，也就是在蒋介石等人启程回国的前一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sup>2</sup>，并要求蒋介石将决议转交给孙中山。同时，决议文本也送给了正在北京与北洋军阀外交谈判的加拉罕和正在广州担当孙中山政治顾问的鲍罗廷<sup>3</sup>。

## 国民党一大宣言，对“民族主义”的阐释成为争论焦点

鲍罗廷迟至 10 月上旬才抵达广州<sup>4</sup>，12 月 30 日才从加拉罕的信中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文本，但他很欣喜其所正在进行的工作正与决议的精神相符——由此我们也可以基本排除由鲍罗廷建议起草相关决议的可能性。在鲍罗廷看来，国民党在政治上的软弱，其主要原因就是党内“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是一片混乱”，“既没有纲领，也没有章程，没有任何组织机构”<sup>5</sup>，力图通过对国民党的改组，从组织上、思想上改造国民党<sup>6</sup>。——显然，这样的工作正与共产国际的决议殊途同归。1924 年 1 月 1 日，收到决议文本仅仅两天的鲍罗廷，就在上海举行的共产党和青年团联席会议上，提出“可以从共产国际关于支援民族革命运动的决议中，特别是从共产国际执委会最近的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相一致的提纲<sup>7</sup>中”“确立我们对国民党的总的态度”<sup>8</sup>。鲍罗廷的想法可谓一箭双雕：即可以赢得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对国民党的支持<sup>9</sup>，因为党和团的决议可以通过国民党得到贯彻实施，又可以从思想上改组国民党<sup>10</sup>。在共产国际决议精神的基础上起草的国民党一大宣言草案<sup>11</sup>，在征求意见和修订的过程中不仅遭到国民党人

<sup>1</sup>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313—314、329、330—331 页。

<sup>2</sup> 《巴拉诺夫关于国民党代表团访苏情况的书面报告》。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345—346 页。

<sup>3</sup>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280 页。

<sup>4</sup> 鲍罗廷抵达广州的时间是 10 月 6 日。

<sup>5</sup>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370 页。

<sup>6</sup>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工作，早在鲍罗廷到来之间已经开始实施，但是成效不大。孙中山于 10 月 18 日签署命令，任命鲍罗廷为改组国民党的顾问和组织教练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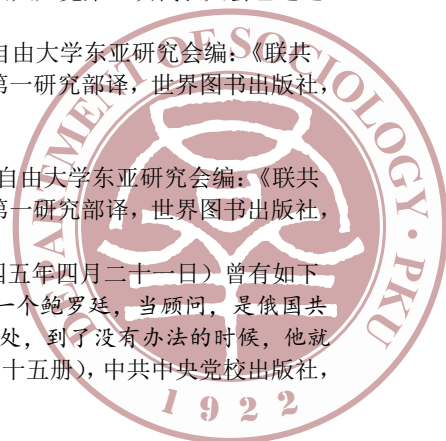
<sup>7</sup> 即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中国国民党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也通过了承认“民族自决权”的决议。相关研究与分析另外专文论述。

<sup>8</sup>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441 页。

<sup>9</sup> 党内对于是否应与国民党合作当时有不同意见。

<sup>10</sup>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441 页。

<sup>11</sup> 对宣言的起草过程毛泽东 1945 年在《关于“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曾有如下回顾：“（国民党一大）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他办好，其中有一个鲍罗廷，当顾问，是俄国共产党员，有一个瞿秋白，是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员。孙中山这个人有个好处，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找我们。鲍罗廷说的话他都听”。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士的反对，就是中国共产党内也有质疑的声音。宣言对于“民族主义”的阐释就成为争议的焦点之一，“要不要承认民族自决权”、“要不要立即与少数民族开展有组织的联络”、“要不要实行联邦制”等等问题，不出意料的成为争论的焦点。毛泽东在发言中，就明确表示了对承认民族自决权会刺激英国对西藏觊觎之心的担心，要求做“更明确的表述”<sup>1</sup>。面对党内外激烈争议，孙中山本人也表示不赞同甚至反对一大宣言<sup>2</sup>。孙中山在宣言发表前一天紧急约见鲍罗廷，要求收回一大宣言草案，但鲍罗廷“作了否定的回答”<sup>3</sup>。在鲍罗廷的坚持之下，鲍罗廷还是说服孙中山放弃了取消国民党一大宣言的想法。国民党方面最终也只是对鲍罗廷主导起草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做了一些文字修改和订正，就提交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通过之后的1月27日，鲍罗廷还根据加拉罕的指示，对宣言文本做了几处修正<sup>4</sup>。

鲍罗廷的工作，得到了加拉罕的高度肯定，称鲍罗廷发挥了“民族斗争的两个方面的思想”。1924年2月9日，加拉罕给契切林写信介绍国民党一大刚刚通过宣言内容，写道：“关于民族主义一条非常有意思，那里民族主义是按照共产国际的声明的精神解释的，而且还发挥了关于民族斗争的两个方面的思想，即一方面是同压制中国民族独立的帝国主义的斗争，另一方面是通过赋予中国境内各民族以自决权的办法实现各民族的解放，而这一条还发挥了去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的有关部分”<sup>5</sup>。同时，加拉罕在信中，也提到宣言中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内容也都是以共产国际的同一项决议为根据。显然，中国各民族的“各族斗争甚至相互斗争”，有利于“外蒙独立”和苏联驻军，而这正是当时苏联政府的国家利益所在。

正如史书所言，国民党一大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奠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是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正式形成的纲领性文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大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这是我们应当坚持的基本评价和基本立场。但对国民党一大宣言的不足与缺陷，我们也应当有清醒的认知和客观的判断。就“民族主义”的部分而言，宣言确立的“彻底的反帝国主义”的目标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无疑是孙中山“新民族主义”思想的概括和升华，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理。但其所主张的“民族自决权”、“自当随国内革命势力之伸张，而渐与诸民族为有组织的联络”的观点，却绝非不了解中国国情、输出苏联革命模式那般单纯和简单，而是借助共产国际的决议夹带着大国沙文主义者贩卖的“私货”，另有所图。只有剔除这些“私货”，才有可能真正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有机结合”，才有可能推进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

## 两头好中间差，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

---

1989年版，第98页。

<sup>1</sup>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469页。

<sup>2</sup> [美]丹尼尔·雅各布斯：《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殷罡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130页。

<sup>3</sup> [苏]鲍罗廷：《鲍罗廷笔记（1924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566—570页。

<sup>4</sup>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476—479页。

<sup>5</sup>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412页。



关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作用，毛泽东曾经作过这样的结论：两头好，中间差。周恩来补充说，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sup>1</sup>。虽然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相关决议，充分暴露了苏俄和共产国际帮助中国革命的双重用意——一方面固然是推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帮助中国实现民族独立解放；另一方面却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殖民地国家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服从世界革命——民族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需要，哪怕牺牲本国主权和本民族的利益也在所不惜。西方学者认为，苏联外交战略和策略由两个不同职能的渠道实施：一个是外交人民委员部，一个是通过共产国际。从表面上看，共产国际被认为是独立的集体的国际共产党人组织，而实际上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财政上都处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严密控制之下；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同苏联驻北京外交机构在工作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兼顾”地完成他们的任务，而外交官员为共产国际代表在这个国家的工作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从而保证了中央和地方执行力度不同然而统一的外交方针<sup>2</sup>。这样的结论和指责显然是出于污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诋毁共产国际的政治目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从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共产国际既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性组织，同时又不得不服务和服从于代表苏联国家利益的外交机构，这是历史事实。至少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对鲍罗廷的任命决议中，就突出体现了这一点。决议要求鲍罗廷与外交人员一同赴任，“并责成鲍罗廷同志与苏联驻北京的全权代表协调自己的工作，并通过后者同莫斯科进行书信往来”<sup>3</sup>。在推进国际共产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的阶级利益，与维系苏俄国家利益之间，共产国际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角色失范和取向矛盾，而最终的取舍却往往是偏向苏联的国家利益，因为“苏联是无产阶级的祖国”。尽管苏联党内有人曾提出“应当彻底消除党为外交人民委员部服务的观点”，“让党还是一个党”<sup>4</sup>，但这也不过是国际共产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的阶级利益服务服从于苏联国家利益的一个历史注解罢了。

1924年5月31日，经过长期的马拉松式的谈判，北洋政府在重重压力之下终于与苏联政府达成妥协。北洋政府的外交部长顾维均与苏联外长加拉罕在北京签定《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声明书》<sup>5</sup>，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并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同时接受“一俟有关撤退苏联政府驻外蒙军队之问题，即撤兵期限及彼此边界安宁办法，在本协定第二条所定会议中商定，即将苏联政府一切军队由外蒙尽数撤退”的暂缓撤军的条款。但各方协议的笔迹未干，外蒙即在1924年11月26日在苏联支持之下宣布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sup>6</sup>，改库伦为乌兰巴托，制定仿苏“宪法”并允许苏联驻军<sup>7</sup>。外蒙古形势的急遽变化，使中国国民党内对苏俄援助中国革命的政治动机和政治目产生严重怀疑，国民党右派也找到了攻击苏俄、攻击共产国际、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口实，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受到严重损害。国民党右派抓住苏联出尔反尔策动外蒙“独立”<sup>8</sup>，而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又支持——至少是不反对外蒙“独

<sup>1</sup> 周恩来：《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一九六零年七月十四日、十五日）。《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0页。

<sup>2</sup>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9页。

<sup>3</sup>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5页。

<sup>4</sup> 《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1923年8月25日于北京）。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世界图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7页。

<sup>5</sup>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23—425页。

<sup>6</sup> [蒙古]锡林迪布等著：《蒙古人民革命三十年》，向群译，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3页。

<sup>7</sup> 八世哲不尊丹巴于1924年突然辞世。具体原因史学界尚无定论。

<sup>8</sup> 其实早在1919年8月，苏联政府在其致外蒙的通告中，就明确声明“蒙古是自由的国家”，“国内的全部政权



立”的事实大造舆论，污蔑中国共产党“幼稚”而“盲目模仿苏俄”<sup>1</sup>，污蔑共产国际“不过是苏俄侵略之工具”<sup>2</sup>，诋毁苏联不仅不履行诺言归还侵占中国之领土和特权，反而又侵占外蒙古损害中国的国家主权；不仅不帮助反而阻隔中国国民党与外蒙古国民党之间的联系往来，损害中国国民党的党权，实则为“柔性之帝国主义”<sup>3</sup>，主张反苏、反共、反国共合作，要求改变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已然出现裂痕。1927年4月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先后“叛变革命”，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从此陷入低谷。

国共两党的分道扬镳，虽然有其历史必然性，但是共产国际强加给国共两党的“民族主义”路线、苏联打着“国际主义”旗号为本国利益而牺牲他国利益的“大国沙文主义”，难辞其咎。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是因为在苏联国家利益上包藏私心，共产国际通过的相关决议在民族主义的表述上就会更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就会更加符合中国革命形势与任务的实际需要，就会更加尊重孙中山、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意见，而不会人为地炮制理论误区、制造政策障碍、设置路线陷阱，不会强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进而给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造成那些完全不必要的、重大的损失和伤害。遗憾的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和共产国际所强加给国民党一大宣言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违背共产国际决议精神、违背苏联革命历史经验的“各民族各自斗争甚至相互斗争”的“先分裂，再自由联合”的民族主义路线，对民国时期民族政治的负面影响更为久远<sup>4</sup>，需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更长时间的革命实践、更多的牺牲和损失，才能逐渐摆脱和消除。

## 【论 文】

# 孙中山为什么反对“民族自决”？<sup>5</sup>

## ——国民党一大宣言及其对民国民族政治的影响（三）

熊芳亮

辛亥革命之前，作为革命派的领袖人物，孙中山是“排满革命”的积极倡导者和领导者，推翻“满清”统治、“光复”“汉人国家”无疑也是孙中山的政治目标。辛亥革命之后，新建立的中华民国采纳立宪改良派所倡导的“五族共和”作为维系统一、建立共和的政治纲领。孙中山也以为“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sup>6</sup>，宣布放弃以“排满革命”为主旨

---

和司法权应属于蒙古人民”，“外国人无权干涉蒙古内政”（[蒙古]锡林迪布等著：《蒙古人民革命三十年》，向群译，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页）。可见无论是对孙中山，还是对北洋军阀所做的关于外蒙问题的政治承诺、达成的政治协议，都不过是苏联政府在外交上的权谋之计。

<sup>1</sup>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03页。

<sup>2</sup>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69页。

<sup>3</sup>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80—481页。

<sup>4</sup> 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要不要实行联邦制的讨论和争议，核心问题仍然是如何理解列宁“民族自决权”思想。

<sup>5</sup> 本文刊载于《中国民族报》2012年7月27日，第7版。

<sup>6</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

